

責任編輯 蘇健偉
封面設計 周安迪
版式設計 吳冠曼
排 版 陳先英

書 名 中華文化簡明讀本
著 者 干春松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4 樓 A 室
版 次 2018 年 6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特 16 開（165 x 240mm）280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4285-8
© 201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授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以外地區獨家出版、發行。

目 錄

第一章 考古發現與中華文明起源

一 「滿天星斗」與「炎黃子孫」.....	002
二 紅山文化與「龍的傳人」.....	005
三 二里頭與夏	007
四 殷墟與早期城市	010
五 中國神話與《山海經》.....	014

第二章 天下國家與制度禮俗

一 中國的疆域沿革	024
二 中國的行政區劃沿革	030
三 宗族與宗法	034
四 天下制度	041
五 封建制與郡縣制	045
六 禪讓與世襲	050
七 天子與皇帝	055
八 輔政制度與中國古代的文官系統	060
九 察舉制與九品中正制	065
十 中國傳統教育制度	069
十一 科舉與書院	077
十二 禮法合治與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	084
十三 近代法律轉型中的禮法之爭	092
十四 中國古代的軍事制度	098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十五 中國古代的土地制度	108
十六 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	113

第三章 思想與信仰

一 早期中國思想的形成	122
二 中國思想文化形態的演進脈絡	127
三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人生智慧	149
四 中國思想的主要派別	168

第四章 藝術與審美

一 禮樂文明：儀式、音樂與秩序	204
二 儒釋道與中國的審美文化	209
三 唐詩和宋詞	213
四 明清小說	222
五 中國書法與中國文人畫	230
六 中國建築的倫理與審美	239

第五章 中外文化交流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 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	246
二 中醫文化與中西醫結合	253
三 「各美其美」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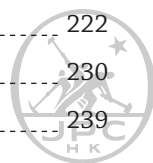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264
------------	-----

索引	266
----------	-----



•

考古發現與中華文明起源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考古的發現對於瞭解一個地區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來自考古遺存和傳世文獻資料方面的證據，那麼許多歷史的記載就只能算是「傳說」。20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方面是「疑古」氾濫，特別是以顧頡剛為主的「疑古派」對夏朝及堯、舜等古代聖王是否真實存在持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考古學科成立以來，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又為我們瞭解遠古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在這些發現中，有包括距今一百七十萬年前、具有人種起源意義的元謀人，以及稍後的藍田人和北京周口店附近發現的北京猿人等，其中北京猿人被認為與黃種人的起源具有一定的關係。

在此之後，與中華文明的起源直接相關的更多考古發現也越發受人關注。這些不斷發現的考古材料使我們得以對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歷史進行一種輪廓性的描述。這些材料也提示著，《史記》中有關五帝時代的記載，並非只是「虛構」，其中有豐富的歷史信息。

一 「滿天星斗」與「炎黃子孫」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從現有的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形成期的空間分佈十分廣闊，南到廣東、北到黑龍江直至目前俄羅斯的貝加爾湖地區。氣候條件跨越了亞熱帶、溫帶和寒溫帶。如此廣闊的地理區域，自然環境差異很大，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方式，留下了面貌各異的物質文化遺存。這也就是為何有人將這樣的起源方式概括為「滿天星斗」的原因。

綜合考古學家的看法，到公元前4000年前後，中華文明經歷了突破性的發展。其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公元前

4000年至前3300年，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空前繁榮。大約相同的時期，長江中下游也進入了繁榮期。第二階段自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或稍晚，以長江中下游、錢塘江南岸的良渚文化為代表的社會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文明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黃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區，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開啟文明化的進程後，穩定發展。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遼西地區，其文明化起步的時間和海岱地區相近，許多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其曾經的繁榮。第三階段是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時期，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湧現出一批城址，諸如金沙、三星堆等，而長江中下游和遼西的文明卻衰落了。不過，中原文化卻再度「復興」，陝西、河南、山西等地重新成為中華文明發展的推動者。

這些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階段的文明發展之間交互作用，互相影響，從而使語言、信仰和習俗等方面不斷接近，最終構成一種「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態。

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關注，古人的努力可能要超出現代人的想像，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歷代史家，根據他們所能收集到的文獻材料進行了創造性的綜合，雖然有一些「想像」的成分，但亦非完全虛構。比如，中國人一般自稱「炎黃子孫」，這個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國語·周語》，該文提出鯀、禹和夏人之後，以及姜姓之後，都是黃帝和炎帝的後代。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也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而後來的帝王都是黃帝的直系子孫。由此，黃帝也被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即文明歷史開端意義上的開創者。

其實，司馬遷將黃帝塑造為中華傳統始祖的做法自有其依據。在春秋時代，孔子與他的學生可能就已經開始討論有關黃帝的傳說。據《大戴禮記》記載，孔子與宰我有過如下的對話：「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在孔子看來，黃帝是否真活了三百年並不重要，關鍵是生民得其利，而後世的人敬畏和接受其教化共三百年。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命長度是以他為人類所做的貢獻來衡量的。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中的《黃帝紀》即是將上古中國的許多偉大的事功都歸結到黃帝身上，因而賦予黃帝以特別的意義。

歷史上中華文明區域內的其他民族，有時也會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比如遼代的契丹族就在描述他們民族歷史的典籍中稱自己是黃帝的子孫。這樣的說法，也可以看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念在民族觀念中的體現。

雖然，對黃帝本人考證具有許多「想像」的成分，不過，在歷史上也一直有人試圖進行「實證」性的證明。如宋代學者邵雍《皇極經世》一書，大意在於運用《周易》中數的理論推究宇宙起源和社會歷史變遷的規律。在該書中，邵雍說黃帝元年距當時 4625 年，書中還將堯元年稱為甲辰年。據清末民初學者盧景貴考訂，黃帝元年相當於公元前 2357 年。再據更久遠的晉代學者皇甫謐所作的《帝王世紀》推算，堯以上共有五帝，歷時 341 年。按照這個說法，黃帝元年應為公元前 2698 年，這一論斷後來得到廣泛接受。近代以來，隨著民族觀念的傳入，「炎黃子孫」的觀念，被用來激勵中國人團結起來，抗擊外侮。針對西方人採用耶穌紀年的做法，許多學者提出了「黃帝紀年」，最著名的例證是 1912 年當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曾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 4609 年為中華民國元年。」雖然孫中山的做法有政治上的考慮，不過，將黃帝看作中華五千年歷史的起源已經廣為接受。

黃帝是傳說中的上古帝王，關於他的事跡，儘管夾雜有許多神話

傳說和比附的內容，然而因為在中國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中，以黃帝作為中國歷史的開端，所以黃帝的開端性地位得以穩定確立。

二 紅山文化與「龍的傳人」

如果黃帝是由眾多早期的傑出人物而逐漸凝聚的種族始祖，而「龍」則堪稱是中華文化的圖騰。

20 世紀 70 年代，在內蒙古赤峰地區，一位農民在修梯田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發現了一塊像鉤子一般的石頭，這塊石頭口閉吻長，上棱起翹，吻前伸上翹，身體如鐵鉤一般細長捲曲。不過，這件造型獨特的石頭，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遼寧省建平縣出土了一批玉製品，經考古學家考證，這一批文物與十幾年前內蒙古赤峰地區發現的文物屬於同一時期的文明類型，並因發現地赤峰而命名為「紅山文化」。在這批新發掘的文物中，有一件玉器十分罕見，出土後甚至引起了考古界和學術界的爭論。這一玉器形似玉豬，卻身形修長彎曲、首尾相連，體現出龍的特徵，豬首含有獠牙，肥頭大耳，與赤峰地區的石鉤般的玉器頗有相似之處。經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考證，這兩件玉器均屬於紅山玉龍，是紅山文化的重要見證。

其實，在紅山的玉龍出土之後，一直有關於「龍」的考古發現。1987 年 8 月，在河南省濮陽市的西水坡遺址發現了一組屬於仰韶文化的遺跡。在其中的 45 號墓中，發現了以蚌殼擺放的龍虎圖案。龍昂首、曲頸、拱背、體彎曲、長角、大眼、張口露舌、顯齒，足端有四個至五個尖爪。這大約能說明當時已經有比較固定的龍的形象，而這件距今大約六千年的龍圖案，也被稱為「中華第一龍」。

在新石器時期的中晚期，大約距今 6700 至 4000 年的這段時間的不同地區考古發現中，龍的形象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雖然龍的頭部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人頭，有的是豬頭，也有類似馬和鹿甚至魚的頭的，然而身上有鱗、體彎曲、有爪等核心特徵卻是一致的，這表明這種圖騰在當時已經廣為流傳。而在《史記》中，炎帝的出生，就被描述為其母遊華陽時與「神龍首」相感而生。也因為龍在中國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

龍不僅出現在考古發現中，也經常出現在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在這些作品中所出現的「龍」既能行雲佈雨，又能飛沙走石，既有禳災除禍的善行，又有作惡多端的劣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我們不乏龍的形象，人們熟悉龍的喜好和習慣，甚至熟悉它所生九子的各自不同的功能，屠龍術和葉公好龍的記載也早已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故事，但龍卻是人們在現代生活中早已無法確切對應的神獸。可是，在《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中，中國古人曾嚴肅地討論龍是否真實存在：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

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

故龍不生得。……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在這段文獻中，魏獻子與蔡墨討論何以不得見龍的原因，魏獻子認為，或許是因為龍是最具有智慧的動物，所以人無法捕獲而得見。蔡墨卻認為，古代有專門負責豢養、馴育各種動物和神獸的職官，這類職官的功能世代相傳，亦有相應的名號和姓氏。而豢養龍的職官因為失職，導致龍得不到精心的照料，故而隱匿，人便不得見。但是，蔡墨極其堅定地認為「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從上述對話我們可以瞭解到古人確信龍是真實存在的，只是沒人見過而已。以現在的眼光看，龍是人們綜合不同動物的因素而糅合在一起，並賦予其非凡的「法力」。而這一圖騰信仰在後世時間的磨礪中，龍的形象不斷演變，其文化含義、思想意蘊愈益豐富，最終成為中華文明乃至華夏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徵，逐漸成為整個中華文明的共同信仰和統一的意義符號。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三 二里頭與夏

《論語·八佾》篇中記載孔子的話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在這裏孔子說道，他對夏和殷商的「禮」雖然能言說，但並不能以杞國和宋國來引證，因為文獻上的證據並不充分。這裏所說的夏和殷，一般指的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兩個王朝，而在儒家的敘事體系中，夏、商、周也被視為是理想政治的範型，即所謂的三代之治。

但在 20 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夏朝是否存在卻是飽受爭議的，理由依然是缺乏足夠的考古材料做證據。1928 年，隨著甲骨文

被發現，董作賓等人在中研院考古所的決定下開始發掘安陽殷墟，直至 20 世紀中期，商王朝的存在有了無可辯駁的依據，但是關於夏的存在，無論是在商代的甲骨卜辭中，還是都城遺址，都缺乏足夠的證據。所以，傑出的歷史學家楊寬和考古學家陳夢家，都否認了夏王朝的存在，他們認為關於夏的種種記載，無非是周人依據神話傳說輾轉演義而成，或者是從商朝的歷史中分出來的。那麼，大禹中斷了禪讓而將帝位繼承給啟的歷史轉折，還有荒淫的夏桀的記載難道都是後世的歷史編纂者杜撰的嗎？

為了解開關於中國早期歷史上的種種謎團，徐旭生先生根據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走訪二里頭一帶重要遺址，寫成《1959 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為夏王朝的考察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李學勤等專家開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課題，試圖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對地下地上文獻進行綜合研究，以確定早期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

有一處考古發現很大程度上為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線索，這就是二里頭遺址。

夏文化的探索，與對二里頭文化認識直接相關。後來稱為二里頭文化遺存的系列文明遺跡，1953 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發現，1956 年在鄭州曾被稱為「洛達廟期」。1958 年發現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在 1959 年豫西「夏墟」調查後進行了系統發掘，二里頭文化的命名得以確立。二里頭遺址被視為是一處都城遺址，總面積約 3 平方公里。遺址內發現有宮殿、居民區、製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遺跡，已經可以看出有規劃的都邑的意圖。出土物品中存在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其中的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20 世紀 80 年代，人們普遍認為二里頭文化或其較早的部分屬於夏文化，但近年來亦有學者認為二里頭文

化屬於夏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都城，並不能確定無疑地斷定其屬於夏文化。

與夏文化相關的另一處考古發現是陶寺遺址。據古史傳說，在堯活動中心地區的山西南部，考古研究者在襄汾陶寺遺址新發現了距今 4300 至 4000 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長約 1000 米、寬約 580 米，面積為 58 萬平方米。到了中期（距今約 4100 年），建成了長 1800 米、寬 1500 米，面積達 280 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內的東北部應為較有地位的人的居住區，這裏發現了規模達 1 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在這個基址上出土了一些陶製的瓦片和其他建築材料。在出土的陶器表面，還發現了疑似文字的刻畫，表明當時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文字。陶寺遺址中出土的以銅為原料的祭祀用品和日用生活用品，說明那時人們已經學會了冶煉金屬。陶寺的發掘最初也是作為夏文化的一個可能的遺存而展開的，但最近的研究者越來越傾向於將其認定為堯都平陽。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堯帝曾建都於此。而陶寺的種種發現又證實其曾經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時間是公元前 2450 至前 1900 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 2100 至前 2000 年。陶寺與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合度。

除了二里頭和陶寺，1975 年登封王城崗城址被發現，有的學者主張該遺址就是禹都陽城，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該遺址屬龍山晚期。從這一時期起，諸如河南禹縣瓦店、鞏義稍柴、偃師二里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鄭州小雙橋，以及最近發掘的安陽洹北商城、河北邢台東先賢等遺址，都有學者指為夏商都邑所在。儘管這些均存在爭議，然而，其對瞭解夏商文明的意義，是必須充分肯定的。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